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郭英剑教授

美高校首次宣布与人工智能公司合作
拥抱人工智能,高等教育别无选择

■郭英剑

1月18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宣布,该校将与人工智能软件 ChatGPT 的母公司 OpenAI 深度合作。该校成为了美国乃至世界上首家与该机构合作的大学。

ASU 与 OpenAI 此次合作缘由何在,对将来高等教育又有着何种影响?

一所公立大学的创新之举

众所周知,美国顶尖大学多为私立大学,这导致人们讨论美国大学时,往往会忽视其诸多公立大学。但事实上,美国公立大学中的佼佼者,无论是生源还是学术声誉与影响力,并不亚于私立名校。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大多数公立大学都是州立大学,并由州政府运营,通常都有专门的“公立大学系统”。而且,美国的每个州都拥有至少一所公立大学,一些较大的州往往拥有多所。

作为一所知名的公立大学,ASU 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 2024 年最新排名中,位居全国性大学的 105 位,在公立大学排名中位居第 51 名。这所成立于 1885 年的公立大学,在 2016—2023 年间,曾连续 8 年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选的全美创新力大学排名榜中位列第一,因此享有创新性、研究型大学的盛名。

1月18日,ASU 成为首家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合作协议的大学。

自 2022 年 11 月底 ChatGPT 正式问世至今,各种机构与组织对生成式 AI 工具的使用量可谓激增。据 OpenAI 公布的信息,截至去年 8 月,超过 80% 的《财富》500 强公司的团队都使用了 ChatGPT。但高校中尚未有与人工智能公司合作的先例。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ASU 首席信息官高尼克表示,研究表明,有近 2/3 的各级组织在积极探索人工智能的整合问题。“通过提供先进的人工智能功能,这些工具正在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允许个人和组织(无论其规模或资源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做出创造性、创新性的努力。”

据报道,ASU 和 OpenAI 之间的合作是要将“ChatGPT 企业版”的先进功能带入高等教育,在提高大学的学习力、创造力以及学生成绩方面作出新尝试。

OpenAI 与高校的初次双向合作

“ChatGPT 企业版”由 OpenAI 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推出。其可以提供企业级的安全和隐私保护、无限量的高速 GPT-4 访问,以及更长的上下文窗口,从而处理更长、更多的输入信息。此外,它还拥有高级数据分析功能,自定义选项等。

改革 20 年后,书院制探索仍须避免流于形式

■刘震 张亚群

2005 年,西安交通大学在我国高校中首次全面实施书院制,这成为了改革开放后,书院制在国内高校普及的一个新起点。刚刚到来的 2024 年,是书院制在我国推行的第 20 个年头。

20 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在原有“学院制”的人才培养组织架构基础上,开展了“书院制”人才培养改革,以期探索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新路径,构建社会所需通专结合创新型人才。

然而,高校书院制改革在取得了明显成效,探索了有益经验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质疑与困扰。在当下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高校需要进一步深化书院制变革,才能实现新时代的育人目标。

现状:蓬勃发展、类型多样

据不完全统计,2005 年至今,全国已有百余所高校实施了书院制改革,成立了约 400 家书院,而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长。其中,高水平大学是高校书院制改革的主力军。高校书院制改革已成为“双一流”高校,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的一项重要且常见的育人模式改革举措。

与此同时,民办高校依托天然的体制机制灵活性,在书院制改革中做出了重要的探索和尝试,迅速成为高校书院制改革的重要力量。

总体看来,目前国内高校书院制有以下两种主流模式。

一是定位于学生管理的生活社区模式,如较早成立的复旦大学志德、腾飞、克卿、任重四大书院,西安交通大学的彭康、文治、宗灏、南洋、崇实、仲英、励志、启德八大书院等。有些高校还将书院作为“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将其打造成为实施“三全育人”的重要抓手。

二是定位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验班模式。如北京师范大学励耘书院,兰州大学萃英学院,南开大学伯苓书院、芝兰书院,天津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与 OpenAI 的合作让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全新技术已深植于大学的社会转型、创新创业和应对社会最大挑战的使命中。高等教育别无选择,唯有迎难而上。

ASU 校长克劳说,他们认识到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将继续存在,对它们成为令人难以置信的工具感到乐观。这些工具可以帮助学生学习,提高其学习效率,也能帮助学生更全面地理解学科。他强调:“此次合作反映了我们的理念和承诺——我们要直接参与到人工智能学习技术可靠的演变发展过程中。”

从今年 2 月开始,ASU 将就如何创新性地运用 ChatGPT 企业版征求教职员工的意见。据悉,该校重点关注 3 个关键领域,即提高学生的成功率、为创新研究开辟新途径,以及简化组织流程。

高尼克说,其目标是通过人工智能驱动的项目开发,彻底改变教育技术,协助学术研究并提高行政效率。该平台优先考虑用户隐私,采用企业级安全措施保护用户数据。这些措施旨在防范数字安全威胁,为利用平台功能提供安全的环境。

OpenAI 首席运营官莱特坎普表示:“学习是众多用户喜爱 ChatGPT 的核心原因。ASU 通过将 ChatGPT 融入其教育项目,继续引领创新。我们很高兴向 ASU 学习,并致力于扩大 ChatGPT 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应用范围。”

在具体的合作内容方面,目前双方并未公开说明,但就媒体报道透露出的信息来看,双方的合作主要包括以下 3 个方面。

第一,ASU 免费使用 ChatGPT-4。此次合作的核心是,ASU 校内获得批准的师生,可以无限次地免费访问 ChatGPT-4。该校并未透露由此要向 OpenAI 支付多少费用,但我们知道,GPT-4 的个人用户账号通常每月要花费 20 美元。

但 ASU 启动双方合作伙伴关系的主要目标,是要确保即将参加工作并获得这些技术的学生拥有公平的机会,并称这是对技术创新未来的投资。

第二,ASU 拥有自己的工作空间。这次双方的合作解决了一个隐私问题。ASU 能在 ChatGPT 中拥有自己的工作空间,凡是获得



批准的 ASU 成员,都可以使用他们的校内电子邮件和密码访问该空间。而且,他们的数据不会被用于训练 OpenAI 模型。

第三,双方更广泛的合作意向。据报道,ASU 在帮助学生成功、为创新研究开辟新途径,以及简化组织流程等方面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也有报道说,双方将课程开发和个性化辅导视为潜在的焦点。

ASU 致力于探索未来的人工智能

ASU 与 OpenAI 的此次合作并非偶然,更非一时兴起,而是源于该校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

2023 年 8 月,该校宣布将继续探寻技术和创新之路。ASU 企业技术部将推出“人工智能加速计划”。这是一个新技术专家团队,致力于创建下一代人工智能工具。该团队的使命是为学生的学习提供积极、有效的方法,为突破性研究探索新路径,并开发技术基础设施,以实现更高效的业务运营模式。

事实上,“人工智能加速计划”是 ASU 企业技术部门领导的一项更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一更大计划旨在从战略上推动大学发展,使所有学生、教职员工能利用人工智能的优势,提高日常工作效率。

该专家团队汇集了 15 名工程师、数据科学家和 AI 开发工程师,以期推动 AI 平台和产品的开发。团队执行主任瑞雷说,他们的目标是开发能有效满足学生和社会需求的人工智能平台和产品,包括提高每个人的学习能力及获得知识和整体进步的技术能力,也包括提升高等教育的透明度、承受力与个性化程度的相关问题。

该团队的工作已在进行中。目前,他们正在开发一个新平台,为全校所有学术团队提供下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该平台旨在完成各种任务,例如训练和部署大型且分散的语言模型、自然语言处理、预测建模等。通过这些模型,大学可以针对学生的入学率、学生体

验、工作运营等作出明智决策。

该平台降低了教职员工使用人工智能的门槛,加快了工作的部署速度,并确保了系统的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

“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技术突破,还取决于我们的协作和创新能否带来具有积极社会影响的解决方案。”瑞雷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愿景是利用人工智能的独创性,促进人类潜力的进步和公平分配。”

双方合作的利与弊

ASU 与 OpenAI 的合作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1月19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发表专题文章《ASU 与 OpenAI 成为合作伙伴,这意味着什么》,对此做了简要分析。

目前来看,ASU 师生对此既充满了期待与兴奋,也深感疑虑,甚至怀有恐惧之心。

一方面,广大师生都在努力思考如何用好 ChatGPT,因为这个工具极具潜力,他们也渴望学校与 ChatGPT 进行更多合作。据报道,约有 20% 的人参加了该校于 2023 年秋季学期开启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培训项目。在很多人看来,人们对 ChatGPT 如此高涨的使用热情,不过是用脚投票的结果。很多对此持乐观态度的人则希望利用生成式 AI 为学生打造最佳的学习体验,并利用这项技术重新设计教学,而非假装它不存在。

另一方面,ChatGPT 也可能使人产生其无所不能的幻觉,并成为作弊的工具。据 ASU 的校报报道,该校计划成立一个道德委员会来监督双方合作。虽然尚未出台具体措施,但该校提供在线资源,以帮助教职员工和学生负责地使用(而非滥用)人工智能。

尽管如此,风险仍然存在。OpenAI 目前正在应对越来越多来自实体组织的版权侵权诉讼,这些诉讼威胁到其模型的基础,即训练数据。当被问及 ASU 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这些未知因素影响时,该校发言人表示,双方签订了年度协议,可以“定期”评估条款和相关条件。但事实上,这样的办法并不能真的解决实际问题。

无论如何,随着上述首创举措的推出,ASU 巩固了其作为美国技术进步领导者的地位。正如高尼克所说,他们为自己的创新方法感到自豪,这使他们在人工智能和高等教育领域脱颖而出。“如果去年被认为是生成式 AI 的突破年,那么 2024 年将是我们进行有意义实践,并探索这项技术是否真正有力的一年。”

ASU 与 OpenAI 的合作让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全新技术已深植于大学的社会转型、创新创业和应对社会最大挑战的使命中。高等教育别无选择,唯有迎难而上。

措施:加强顶层设计、协调“双院”模式

虽然存在上述问题,但必须承认,经过 20

中国大学评论



张端鸿 同济大学 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其“指挥棒”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办学导向。近年来,由于高校管理模式和评价导向趋同,“千校一面”的现象饱受批评,国家层面正在逐步推进高校的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价,国内多个省份也推动了高校分类评价改革,致力于突破“用一把尺子”量高校的做法,引导高校走向分类发展、特色发展。

从多地的实践来看,高校分类评价改革举措取得了一定的实效,对高校规范发展、特色发展、内涵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牵引和推动作用。政府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引导高校在不同的序列上安心发展,办出特色。

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一系列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第一,省域高校数量有限,头部高校和尾部高校很容易出现固化现象。几年改革实施下来,早期的新鲜感很容易消失,评价结果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逐渐走向弱化。

第二,评价指标覆盖高校改革和发展的方方面面,所涉及的观测点数量过多。高校往往要在各种指标上实现发展,不利于真正突出自身的特色发展。

第三,在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各个高校类别中,如果用其他属性来考察,实际上是强行将不同的高校放在一起“硬比”。

第四,国家和地方希望引导高校重点承担的新任务和新增功能往往难以量化,导致评价“指挥棒”缺少显著的导向功能。不少高校的改革和发展仍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使命重大。因此,高等教育要努力发挥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作用,努力实现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带动和引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实现全面高质量发展。

在此过程中,高等教育要更加主动服务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大力提高自主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能力,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服务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仍然基于传统的水平评价和状态监测很难有效发挥教育评价的“指挥棒”作用。从这一宏观视野考察,现行的高校分类评价规范有余,但引导性不足。

这也呼吁高校评价在新历史时期要积极探索新的评价模式,重点考虑如何建立以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为核心、以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经济社会发展为重点的评价机制。让高校从“帽子”、唯论文、唯项目、唯指标的怪圈中走出来。激励高校从自身的使命和功能出发,坚持特色发展,从而实现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当下,仍有很多高校领导对高校评价存在诸多误解。他们把大学排名当成“命根子”,把高影响力期刊论文、国家重大项目、学科评估结果等显性指标看作学校办学质量的“第三方质量保证”,却忘记了高校应以龙头之力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应将人才培养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对经济社会的实际贡献度作为自己的核心使命。只有着眼国家和地方的实际需求,善谋划、肯担当、有作为,才能加快创特色、争一流。

从性质上看,各省域的高校分类评价首先是绩效评价和水平评价。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办学方向、管理水平、办学条件、办学质量、办学声誉和办学成效等几个方面,主要局限在“水平”和“状态”两个维度上。这就使得针对高校的综合测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只有将高校在一定时间维度内承担的重要使命、重点任务和核心功能充分体现到高校分类评价上,才能真正引导高校更有力地服务于促进高质量发展。

每所高校所能承担的使命、任务和功能都具有差异性。因此,不必强求同一类型的高校使用同一套固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逐步探索政府与高校间通过合同或协议的方式,议定发展目标 and 重点任务。

如此,高校分类评价就可以将高校承担任务的达成度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也可以将任务指标、水平指标和状态指标分列,最终做好综合评价。这种做法并不是强化政府对高校的行政干预,而是激发高校的自主活力,更积极、主动地回应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展现更大的主动性。唯有如此,高等教育才能不负“龙头”期望,在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高校评价「指挥棒」该向哪里指

(作者分别为燕山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本文为福建省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三全育人’视域下现代大学书院制育人模式研究”(FJ2020MJDZ039)阶段性成果)